

现代文论与美学论丛

断裂地带的精神流亡

Discontinuity, Dislocation, Disorientation, Displacement

路遥的文学实践及其文化意义

石天强 著



断裂地带的精神流亡

——路遥的文学实践及其文化意义

石天强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断裂地带的精神流亡:路遥的文学实践及其文化意义/石天强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1
(现代文论与美学论丛)
ISBN 978-7-301-15949-1

I. 断… II. 石… III. 路遥(1949 ~ 1992)-文学研究 IV. 1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7022 号

书 名: 断裂地带的精神流亡——路遥的文学实践及其文化意义

著作责任者: 石天强 著

责任编辑: 谭 燕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5949-1/I · 215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s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11.75 印张 186 千字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现代文论与美学论丛》总序

本丛书记录下我和一群年轻同仁的一次难忘的中国现代学之旅：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协力对中国现代文学、文论与美学传统作了一次新的探究。说到传统，人们总会不假思索地以为那只是指类似于“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古代时光，而忽略“别求新声于异邦”的现代，仿佛唯有古代才配称为传统。对置身当代的我们来说，苏轼的“气自华”固然有其不容忽视的回瞥意味，但鲁迅的“求新声”却不能不说正是中国现代历史现场的真实写照。实际上，晚清以来国人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中变法自强、实施启蒙乃至燃烧革命烈火的历史，已经和正在成为中国传统，准确地说是中国现代性传统。在一次新的探究之旅中重新回望作为中国现代性传统之一方面的中国现代文学、文论与美学传统，恰是我们的初衷所在。

从中国现代学视野去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文学、文论与美学传统，是我经多年摸索后找到的一个研究方向。在我看来，中国现代学是关于中国现代文化传统的学问，是中国人对中国现代性文化的研究。与有关中国古代文化的“国学”不同，也与外国学者从事的有关中国问题的“汉学”（Sinology）或“中国学”（Chinese Studies）不同，中国现代学主要研究百余年来中国文化现代性传统的发生、发展、演变及其对当代社会的意义。从中国现代学视野考察中国现代文学、文论和美学，可以更准确而深入地揭示中国文学现代性、文论现代性及审美现代性的面貌及其意义。本丛书旨在对中国现代文化传统与文论特色展开研究，即在中国现代学视野中重新考察中国现代文学、文论与美学，着重发掘中国现代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学和文论之间的互动关系。

这里选取中国现代学这一特定视角，正是企望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和创新。从中国现代学视野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文学与文论，有可能更充分地认

识中国现代传统的文化身份和积极意义。传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始终处于现实状况的选择与熔铸中。中国传统是基于现实需要并在现实中重新创造的由过去传承的符号表意系统。这种传统既有古典性传统,也有现代性传统,两者共同构成我们当今所身处其中的中国传统结构。应当在继续充分尊重和弘扬中国古典性传统的现代意义的前提下,纠正那种只强调古典性传统而忽视或轻视中国现代性传统的偏颇,跨越传统仅限于摒弃古典性传统的成见,充分认识到中国现代性传统是中国文化传统整体的一种新形态,是与古典性传统不同但却同样伟大的新传统,需要积极予以承认并加以认真研究。这种承认和研究,对于正在持续展开的中国现代性进程和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化传统建设及中国文化的个性伸张,都应具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本丛书拟重点考察一些有代表性的现代作家、理论家、批评家及美学家或相关问题,着力探测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文论传统的积极价值,以便在当前新世纪语境中重新认识中国文学和文论的发展历史与现状,并对其未来的发展趋势作新的观照。同时,运用中国现代学视野去重新观照中国现代文学、文论与美学状况,可以揭示以往被忽略的新问题、新现象及其意义,从而为理论探索带来新的拓展空间。

本丛书的主要目的在于:在已从事的关于中国现代性体验和现代性诗学研究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新的开拓。这具体表现为在中国现代学视野中考察如下相关问题:中国现代性的特征、颜面、类型;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特征、类型等;中国现代文化传统新视野中的文论现代性研究,包括文论现代性的发生、演变、特征、类型等;中国现代学新视野中的现代重要作家、文论家、批评家、美学家研究。

纳入本丛书的六种著作各有其研究重心和特色:

胡继华的《中国文化精神的审美维度——宗白华美学思想简论》尝试从“文化精神”角度考察宗白华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的美学研究,把宗白华的美学沉思与中国文化复兴事业结合起来加以观照,得出这种美学是对中国文化精神的审美维度的建构的新结论。该书进而发掘出这位美学家对于作为中国文化精神的“基本象征物”的“节奏”及其文化根源的探究,揭示了宗白华在中国现代美学史上的独特地位及其历史局限性。

周志强的《汉语形象中的现代文人自我——汪曾祺后期小说语言研究》把汪曾祺短篇小说同中国文学文体的现代性联系起来考察,为汪曾祺重新定位。这部书从分析汪曾祺小说语言入手,探讨“文”的文体意识在汪曾祺小说中的具体体现,以此分析短篇小说的文体功能及其不同意义,进而总结中国短篇小说文体的分化与变迁。书中有关“现代韵白”与现代汉语形象建构的分析,尤其体现了著者独到的艺术发现。

梁刚的《理想人格的追寻——论批评家李长之》引人注目地提出李长之是 20 世纪中国最富于独创性及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的新观点,足以令人对这位一度被遗忘和忽略的大批评家刮目相看。该书以理想人格为焦点,去透视李长之在美学批评、文化批评、文学批评和画论批评诸领域的骄人实绩,其分析的重点在文学批评这个李长之最擅长和成就最大的领域,他如何把时代文化精神的重构、作家审美人格的探究以及文学本文语言的诗意分析有机结合起来。对渴望成为文学批评家的年轻朋友,这显然是一部及时的书。

何浩的《价值的中间物——论鲁迅生存叙事的政治修辞》对鲁迅的“中间物”及其革命作了研究,从鲁迅的文学世界来反思中国文学现代性传统诸问题,可谓独出心裁、别开生面,在鲁迅研究上堪称一次大胆的创新。该书的重点不在文学史料的新发现,而在突破现有鲁迅研究范式及权威话语,在思想史层面上重新发掘出被遗忘的鲁迅对现代中国人生存意义新维度的独特建构。鉴于鲁迅对中国文学现代性传统的重要性,这里重新考察鲁迅和他的“中间物”意识,有助于把握中国文学现代性传统的内涵,具有一种先锋的开拓性作用。

石天强的《断裂地带的精神流亡——路遥的文学实践及其文化意义》把路遥置于断裂地带的精神流亡这一新坐标上,更清晰地凸显其在中国现代性传统中的独特价值。该书的主要切入点在空间、身份、形象三个不同视阈,具有突出的解析能力与文化意义,由此呈现出作家及其身份认同的焦虑与小说文本中个体命运的悲剧性,有助于反思中华民族现代性进程中农村和农民的焦虑和困境。

我的《中国现代学引论——现代文学的文化维度》是一部有关中国现代学问题的专论。从标举第三种现代思风入手,提出中国现代学这一独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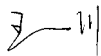
学科构想,规定了它的反构型学思性质,由此出发对中国现代性的特征、颜面、景观和品格作了探索,得出中国现代性是一种后古典远缘杂种文化这一新结论。全书主要结合文学个案展开论述,回放出中国现代性的丰富景观,对相关的革命主义、审美主义、文化主义、先锋主义、拿来主义等种种思潮作了评析,还对近期有关文学个案如王朔和铁凝做了阐释。

这套丛书只是中国现代学旅程的一次处子航,因而欠缺经验、行色匆匆在所难免,期待方家指正。

在筹划与写作多年的这套丛书即将出版之际,我首先要向我的五位合作伙伴表示感谢,他们是胡继华教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周志强副教授(南开大学)、梁刚副教授(北京邮电大学)、何浩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石天强副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胡疆锋博士协助我做了相关组织工作,同时向他致谢。

本丛书属于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西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论建设”(项目批准号为05JZD00028)成果暨北京师范大学985工程第二期长江学者科研项目成果。在此谨向教育部社科司领导、北京师范大学校领导和文学院领导一并致谢。

北京大学出版社文史哲图书事业部张凤珠主任本着对这次学术探究之旅的热忱,给予我们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谨向她和相关社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



2009年5月1日序于北京林萃西里

目 录

《现代文论与美学论丛》总序	王一川(1)
第一章 关于路遥	(1)
一 走近路遥	(1)
二 文学视野中的路遥	(6)
三 路径与方法	(12)
第二章 身份认同与心理焦虑	(23)
一 路遥小说空间结构生成的历史语境	(23)
二 身份社会中的空间记忆	(30)
三 城乡结合部:边缘身份的空间隐喻	(34)
四 空间的内在化:路遥的二元心理世界	(39)
五 二元空间中的语言焦虑	(43)
第三章 男人的世界	
——农民形象的塑造	(51)
一 苦难的历程:乡村景观	(51)
二 历史召唤下的新主体	(56)
三 当代鲁滨逊	(60)
四 启蒙话语的规训	(64)
五 被淘汰的弱者	(68)
六 想象世界中的空白	(72)
第四章 城市梦想中的边缘人	(78)
一 孤独的边缘人	(78)
二 分裂的精神世界	(82)
三 为了生存	(86)

四	无性人:走向衰败	(90)
五	启蒙话语的破产	(95)
六	流浪,流浪	(99)
第五章	都市的远景	(105)
一	路遥笔下的都市形象	(105)
二	都市景观中的身体和欲望	(108)
三	都市中的精英个体与群体	(112)
四	从独异的个体到庸众中的一员	(117)
五	都市中的现代官吏形象	(120)
六	都市的阴影	(123)
第六章	城乡对立下的男性欲望	
	——女人们	(128)
一	被强暴的女性身体	(128)
二	对女人的报复	(132)
三	承受苦难的肉身	(137)
四	知识女性:理想破灭的符号	(142)
五	女性世界的“王”	(146)
第七章	书写的压力	(151)
一	历史理性主义和个体虚无主义	(151)
二	被排斥的命运与自我书写的坚忍	(155)
三	先锋文学对现实主义文学的排斥	(158)
四	“重写文学史”语境中路遥们的命运	(162)
结 语		(169)
附 录		(172)
一	路遥主要作品	(172)
二	参考文献	(174)
后 记		(181)

第一章 关于路遥

一 走近路遥

路遥,原名王卫国,1949年12月3日出生,祖籍陕西省清涧县石咀驿镇王家堡。王卫国出生于一个极为贫困的农民家庭,是真正的“三代贫农”。父亲叫王玉宽;母亲马氏15岁时就嫁到王家,王卫国在母亲18岁时出生,系家中长子。7岁时因为家境困难被过继给家在延川县农村的伯父王玉德。王卫国在家境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小学的学业,但在小学毕业后却面临着失学的危险。这个时期对王卫国具有决定命运的意义。在参加全县小学升中学的考试后他幸运地被录取,同时这也惊动了乡政府。王卫国的养父是在乡政府干部的劝说下同意他继续学业的。这一独特的经历给王卫国以深刻的影响,他在以后的一部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1961年记事》中所描写的故事就是以自己的这段经历为背景,小说因此具有强烈的自传特点;而在小说《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辍学的经历也是以此为蓝本。“文革”初期,贫农出身的王卫国可以说是春风得意过一段时间。1969年9月,年仅20岁的王卫国就任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他曾因此而有过一种出人头地的感觉,但很快发现自己是一个有职无权的角色。1969年底被转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务农,这种经历使年轻的王卫国有一种被戏弄的感觉,并因此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中。在农村期间他做过许多临时性的工作,还在农村一所小学中教过一年书。1973年幸运地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并开始了文学创作,开始在《陕西文艺》(今为《延河》)上发表文学作品;也是在这个时期,他开始使用笔名“路遥”。随后,“路遥”这个名字成为王卫国生命的一部分,他用这个笔名为自己赢得了声誉;也是在这个名字上,他停

止了呼吸。直到今天,许多人都知道王卫国的笔名,却不知道他的原名。大学毕业后,王卫国在多方面的努力下开始任《陕西文艺》编辑。

与其他一些作家不同的是,路遥的一生似乎都是在贫困与动荡中度过的,甚至在他获得了很高的声誉以后也是如此。路遥病逝后,还身负万元左右人民币的债务。根据一些人的回忆,路遥甚至向他的朋友提出,为一些经济名人写专稿争取一些额外的稿费,以支撑自己的生活。^[1]现有的回忆性文字都在证明,这个为新时期文学做出了相当贡献的作家似乎一直处于穷困潦倒之中。同时路遥的爱情与婚姻生活也十分不幸。他曾经有过一段痛苦的失恋经历,这段经历甚至使这个极富个性的人产生了自杀的念头。当路遥最终与林达结婚以后,两个人的情感生活似乎在很长时间内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中,甚至出现了严重的情感对峙等情况。他在去世前,已经着手办理与妻子林达的离婚手续了。这种直接的日常生活体验不会不给作家以影响。另外一个引起我们注意的地方是,路遥的生活极没有规律,甚至是吃饭这类事情也如此,这种生活习惯既与路遥的个性有关,同时也与其情感生活的不稳定有关。应该说,多种复杂的个人、情感因素等是导致路遥早逝的重要原因。

1992年11月17日,不幸染上肝癌的路遥病逝于陕西省西安市西京医院,年仅43岁。路遥对自己的病况似乎有一种直觉,所以在病发前坚决要求回到延安^[2];在延安,路遥的肝病发作并不断加重。在病情无法控制的情况下,1992年9月5日被转送至西安西京医院接受治疗,此时的路遥已岌岌可危了;虽然在治疗期间出现过一些恢复的迹象,但两个月后还是撒手人寰。

路遥的去世在陕西文艺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由此结集出版了大量回忆性、悼念性的文字。如航宇撰写的《路遥在最后的日子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晓雷、李星主编的《星的陨落》(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此外,《延河》杂志还多次出版过纪念专号,刊登回忆、评论路遥的文字。

我们可以把1980年路遥在《当代》上发表的《惊心动魄的一幕》视为他文学创作历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因为这不仅是路遥第一次在全国性权威文艺刊物上发表作品,同时也是他第一次获得了国家级文学权威机构的

认证。这意味着路遥的作家身份第一次获得首肯。虽然在此之前,路遥已经在《陕西文艺》(《延河》)、《甘肃文艺》、《鸭绿江》等刊物上发表了不少作品,但其阵地主要还是在他做编辑的《陕西文艺》上。而在《当代》上发表作品这一事件——特别是这篇作品还获得了当时的文艺理论权威秦兆阳的高度评价,并赢得了1979—1981年度《当代》文学荣誉奖、1981年5月“文艺报中篇小说奖”二等奖、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则是路遥对自我作家身份的一次奠基性仪式。

路遥的文学创作主要集中在1978年到1990年之间,即从“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开始步入深化的历史时期;尽管在1978年以前,路遥也发表了不少作品^[3],但一个事实是,路遥在生命后期为《路遥文集》选稿时,1977年以前的作品都没有被收入。这实际上是作家对自己这段创作经历的一种否定,同时也暗含着对当时自我身份无法确证的焦虑。从1978年到1980年,路遥的文艺创作实际上是积极参与了当时对“文革”进行清算和反思的创作潮流的,包括获奖作品《惊心动魄的一幕》。路遥彼时的作品数量并不多^[4],但这几篇作品已经显示出了其后的文艺创作在选材、构思、叙述视角上的一些特点。

其一是路遥笔下的主人公都有些不合时宜的感觉。例如在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中》,主人公县委书记马延雄不是一个对时代有着清醒意识的人,而是一个派系斗争的牺牲品。当然,叙述人还是将马延雄塑造为一个一心为民的好干部,但从当时的时代潮流来看,这个人物无疑是被打了折扣的。同样,在小说《不会作诗的人》中,公社书记刘忠汉也是一个逆社会政治潮流而动的人,他不是积极地参与到社会政治斗争的潮流中去,而是在逃避它。这一叙述方式理所当然无法为文艺潮流的权力中心所容忍。

其二,此时路遥的作品中,受难的知青是被叙述的正面主角。《夏》中的苏莹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女孩子,其眼光不同于一般的青年。同时在《青松与小白花》中,也有一个漂亮的女知青叫吴月琴。她们都是落难的才女,有着不同寻常的政治身份,父母都是“文革”中落难的高干。但同时她们在乡村又都得到了老百姓的善待。乡村青年杨启迪(听这个名字就够“意识形态”的)爱上了苏莹,而他的善良、正直、勇敢也得到了应有的情感回报。

其三,在叙述上,路遥的叙述视角与启蒙话语最初的运作有一定的差异。这非常鲜明地表现在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的叙述上。小说的情节安排极具戏剧化的特点,马延雄被置于个人生命和群众生命孰轻孰重的漩涡中,被置于派系斗争的漩涡中。在这种情况下,马延雄选择了牺牲个体——而最富有意味的地方还在于,这个被牺牲的个体不是一个观念意识超前的启蒙主义者,他自己甚至就是一个有着很大精神局限性的人物。显然,在马延雄的人物形象塑造中已经出现了路遥以后的作品中经常出现的“边缘人”的形象特征,也正是这种“边缘”性特征使得这部小说的获奖颇富争议。

其四,我们还可以从早期作品中看到路遥对乡村价值的迷恋。在这几部小说中,乡村几乎都是以正面形象出现在我们视野中的;乡村人物形象中的大多数也具有正面价值。这一点可以说一直为路遥所固守,并与同时期其他一些作家将乡村描述为一个混沌的、无知的状态,期待着启蒙精神救赎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例如在叶蔚林的小说《没有航标的河流》中,叙述人“我”就是一个来自乡村而去城市接受教育的青年,借助这样一个处于懵懂中的青年的视角,叙述人描述了正直干部的落难,群众的盲目无知与被驱使的状态;而且由于叙述人的自我精神就是不健全的,我们可以感受到叙述中始终存在着一种疑虑——对时代、环境,还有发生的一切事件的疑虑,并由此进入到一个质疑时代存在合法性的高度上。在这种“疑虑”的语气中,我们可以看到叙述人与被叙述的“我”之间存在深刻的裂痕:被叙述的“我”的懵懂而混乱的精神世界与叙述人对事件的清晰整理之间的巨大裂痕,昭示了知识分子启蒙话语迫不及待寻求表达的姿态和力量,而且只有这种力量才可以填平叙述人和被叙述的“我”之间的这条裂缝。

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路遥的文本积极参与了知识分子启蒙话语对社会的最初建构,但是,他此时的文本似乎缺少一个强大的启蒙叙述主体。路遥似乎更关注文本叙述中个体的选择、追寻、命运等命题,因此叙述人缺乏一种坚定有力的批判精神,这自然与时代语境发生一定的错位。也是这种错位,使得路遥的小说产生了不合时宜的倾向。

1982年,路遥的小说《人生》为他赢得了很高的文学声誉和社会声誉。特别是当小说被路遥本人改编成剧本并由吴天明导演、西安电影制片厂拍

成电影后,在国内引起了持续的关注。我们把《人生》的发表视为路遥明确自己的作家身份并获得社会话语权力的一个象征性事件。因为《人生》不论是在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还是在路遥自己的文学创作中都是十分出色的。^[5]小说关注的主题实际上继承自其前期文艺创作,而且中心更为明确了。路遥对于现实生存中个体命运的关注——尤其是乡村中富有才华的农民命运的关注,在创作中被凸现了出来。但是《人生》只是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高加林何去何从?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对此,路遥自己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并直接反映到了晚期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6]此后他继续创作了一些中短篇小说,但质量远没有达到《人生》的高度。这种创作状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甚至连路遥自己都对其创作能力产生了怀疑。^[7]

从1980年到1985年之间,路遥的小说创作达到了14篇,而且小说被刊载的范围大大超过了前一个时期。尤其当《人生》在《当代》上刊载以后,更是如此。我们由此可以看到路遥的影响和知名度在被权威话语认可后迅速扩张。而这也正是他的作家身份从被公众和理论权威所质疑到被认可的过程。此间路遥文本中的主人公依旧是以农民为主,同时边缘人形象开始成为小说叙述中的主体——其代表就是《人生》中的高加林。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以前在小说中扮演正面形象的知青开始具有了负面特征,这突出体现在小说《姐姐》中。这篇小说中的知青依旧是高干子女,名叫高立民;在他落难的时候,乡村里的“姐姐”接纳了他,并热切期待与他结合的幸福生活。但当高立民的父母官复原职后,高立民便抛弃了苦苦等待他的姐姐。姐姐在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后毅然重新面对生活,并体现出一种特有的高贵品质。而对乡村的美好情感与想象在小说中成为重要的、同时也是最后的支撑。路遥更意味的安排是小说中姐姐的身份:一个多次参加高考却落榜的乡村女性。这正是路遥笔下众多主人公的共同身份特征——具有学生特点的乡村青年;他们有知识、理想、抱负,但没有机遇。

显然,高加林的问题一直在刺激着路遥的思维。1982年起,路遥便开始准备小说《平凡的世界》的创作。在经过了3年的历史资料、生活体验和知识的储备后,他于1985年起开始动笔,至1988年《平凡的世界》杀青。小说的第一部分曾经在《花城》上刊载。^[8]《平凡的世界》是路遥小说的总结性

作品,以前曾经出现过的众多人物形象在这部小说中以一种更成熟的姿态展示了出来。小说的结构庞大,人物关系复杂,的确是一部比较出色的作品。小说在读者群中引起了十分强烈的反响,而且这种影响至今仍然存在于大批读者中;尽管它在理论界以各种名义被贬低,但这丝毫不影响它的接受价值。^[9]路遥自己对这部作品未来的命运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他明确表示,这是一部写给读者的书,而不是写给评论家的书。^[10]这既是作家对自己创作个性和创作身份的一种坚持,也是一种与时代发展争夺话语权的姿态。我们将在本书后面重点探讨《平凡的世界》的命运和它的文化意义。

二 文学视野中的路遥

根据有关学者的归纳,对路遥及其作品的研究大致呈现出如下的状况:

从内容上看,路遥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文本研究;二是作家研究。从时间上划分,路遥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惊心动魄的一幕》发表到《人生》产生“轰动”时期,主要集中在对作品的评论;第二阶段是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出版到1991年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时期,评论家们一方面重点关注路遥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丰富与贡献,另一方面研究其创作心理,形成了路遥研究的高潮,出现了一系列有深度的评论文章;第三阶段是路遥逝世至今,是路遥研究的系统化阶段,出现了一些学术专著。^[11]

根据一些学者的观点,对路遥及其作品的研究,在第一阶段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公认高加林是一个典型人物形象,尽管这个典型形象具有很大的争议性;二是界定路遥作品的艺术和审美风格为“深沉”、“宏大”等特征;三是明确了路遥善于以“城乡交叉地带”为文化地理背景构建小说世界、表现审美理想的创作特点。

在第二阶段,关于路遥的研究的具体成就,一是表现在对《平凡的世界》的评论上。例如,不少研究者认为,《平凡的世界》是对国内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巨大贡献,路遥塑造的孙少平、孙少安兄弟丰富了现实主义艺术画廊中的人物谱系。《平凡的世界》具有史诗性的品格,作品通过对历史和现

实的宏观把握,深刻地展示了我们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是现实主义在国内发展的新成就。这一时期的另一个贡献是注意到了作家的创作心理对创作的影响,特别是肖云儒的论文《路遥的意识世界》,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而肖云儒的《路遥的意识世界》长篇论文,应该是我们目前读到的关于路遥意识研究的最为系统与深刻的专论。虽说其发表在1993年,但是它的写作时间在1991年,故我们把它划入“第二阶段”中加以研究。此文的研究视阈开阔,通过路遥的“苦难意识”、“土地意识”、“历史意识”、“伦理意识”、“哲学意识”、“生命意识”、“悲剧意识”等多种意识的缜密分析,准确把握路遥所拥有的丰富而复杂的心灵世界,提出“路遥的代表性作品,可以说集中了自己在历史转型期两个阶段的人生经历和心灵感受。因而路遥本人和他笔下人物的精神世界,将是我们了解这个重要历史阶段的重要的心灵记录和重要的精神史页”。^[12]

有论者认为《平凡的世界》发表的时间正是我国文坛新观念、新方法、新思潮风起云涌之时,路遥的写作显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因此路遥的文学创作就更具有现实针对性;而《平凡的世界》的发表无疑是现实主义小说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重要收获。^[13]

对路遥的研究的第三个阶段的特点是出现了系统研究的专业性著作。这些作品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对路遥的回忆性文字,例如晓雷、李星主编的《星的陨落——关于路遥的回忆》,航宇撰写的《路遥在最后的的日子》等。这些文字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作家的思想、经历,特别是心理发展轨迹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另一方面是一些专门研究路遥的理论专著,例如宗元的《魂断人生——路遥论》,赵学勇的《早晨从中午消失——路遥的小说世界》,王西平、李星、李国平等合著的《路遥评传》等。这些作品都试图对路遥的创作、生平、心理、文化等特点做出系统性的总结,是对路遥及其作品研究的重要收获。

应该承认,关于路遥及其作品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绩,而且这些研究为我们今天对路遥的理解打下了很好的学术理论基础。但是,在关于路遥的研究论文中,绝大多数论文还局限在“现实主义”、“史诗”、“宏

大、深沉的审美风格”、作家心理的文化品格等方面的界定上,尽管这相对于以往是一种进步,但终究没有走出原有价值观念、理论基础所设定的范围。而文学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并不仅仅在于作品的接受范围、接受数量、接受层次;同时我们也不能简单地从道德判断的角度去指责某一价值立场的学者对作品的忽视。文学作品的经典性来自于文本本身所具有的丰富的时代兼容性,并在时代语境的发展变化中具有不断再阐释的弹性。而这就需要有新的理论基础和新的研究方法的介入,在对文本的再阐释和再接受中,文本所具有的新的意义才能不断被开掘出来。坦率地说,对路遥的研究之所以举步维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研究者太固执于对路遥文本“现实主义”的判断。我们甚至可以从大量论述路遥及其文本的论文中,感受到前后研究在价值观点上的雷同;尽管这些论文对路遥的研究的范围、深度的确有一定的拓展,而且有不少研究者指出了路遥文本中隐含的诸如性别歧视等新的问题,但关键并不仅仅在于这些问题的存在,还在于这些问题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着。而问题存在的方式恰恰是时代和文化语境所特有的。这正是本书切入研究对象的出发点。

在进行讨论之前,还是让我们再看一下近几年对路遥及其作品的研究情况。

我们首先要谈到的是宗元的《魂断人生——路遥论》^[14],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少有的将个人传记和对路遥的评论结合起来的专著之一,在关于路遥的研究中无疑具有重要的位置。从这本著作的撰写上,可以看到,作者占据了尽可能翔实材料,发掘整理路遥的生平,注意了路遥心理世界的形成过程,特别是童年经历对路遥以后文学创作的影响。童年的屈辱、贫穷等生存体验直接导致了路遥心理上强烈的自卑又自傲的复杂情结,这种精神创伤以各种方式体现在了小说的文本中,例如在主人公的形象设置上,在环境的选择安排上,等等。

该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将路遥的创作经历划分为四个时期。其一是“文革”前,作者将此一时期视为路遥创作的起步阶段,在文体选择上以诗歌为主。其二是1977年到1980年之间,宗元将此视为路遥主动按照时代文化的变化调整自我创作思路的时期,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向成熟过渡。其三是1981年到1985年《平凡的世界》创作之前,这一时期是路遥作品的成熟